

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关系

范洪杰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杜甫的诗歌艺术深刻影响了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刘禹锡虽独立于这两大派别之外,但也对杜诗保持了密切关注。在使典用事、雄浑诗风、句法、章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杜甫对刘禹锡的影响。刘禹锡继承和发展了杜甫的怀古诗的艺术,二人都具有深厚的学识和非凡的胸襟,但主体精神倾向上二人存在一定差别,影响到怀古诗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杜甫 刘禹锡 雄浑 用事 章法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853(2017)01-009-06

杜甫诗歌是中唐诗人开启各种新变所借助的重要的艺术资源。杜甫丰富多变的艺术成就对中唐诗坛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如崇尚雄奇怪伟的韩孟诗派继承发展了杜甫的“妥帖力排奰”的一面,而白居易继承发展了其主讽喻的乐府诗艺术,元、白二人又对杜甫的排律作了极大拓展等,学界对此都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关系,似可作更多的探讨。刘禹锡在中唐独立于各种诗派之外,当文学史上的“元和体”^①在京洛和唐王朝的其它区域进入如火如荼的创作时,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正在南方的贬所,所谓“霄汉鸳鸿久绝群”(《酬令狐相公赠别》)^{[1][P409]},正处于与朝中亲友近乎隔绝的状态。他们与杜甫诗学的关系也不同,柳宗元与杜甫没有直接的或明显的诗学联系,而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有较多的联系,但目前尚没有清晰地得到论述。本文就此问题作些探索。

一. 刘禹锡与杜甫诗学关系的直接材料

说明杜甫与刘禹锡的关系的直接证据可见于诸多文字。贞元末刘禹锡在长安期间所作《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示之》云:“碧云佳句久传芳,曾向成都住草堂。”^{[1][P33]}陶敏注:“杜甫在成都浣花溪有草堂,广宣能诗,故借用此事。”^{[1][P34]}笔者觉得这应该有写实的因素。刘禹锡高度肯定杜甫的诗名,在这里强调广宣住过杜甫的草堂,有称美广宣诗艺的用意。

刘禹锡在朗州时与董挺交往甚密,与之论学谈诗,文集中多篇诗歌与文章都与董挺有关。《董氏武陵集纪》(元和三年或四年作)讲到董氏的“幼嗜属诗”,“尝所与游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高韵如包、李,迭以章句扬于当时”^{[1][P917]},“杜”即杜甫,说明杜甫与董挺有交往,这也应是刘禹锡与董挺谈诗论学的话题之一。杜甫有一首《别董挺》:“穷冬急风水,逆浪开帆难。士子甘旨阙,不知道里寒。有求彼乐土,南适小长安。到我舟楫去,觉君衣裳单。素闻赵公节,兼尽宾主欢。已结门庐望,无令霜雪残。老夫缆亦解,脱粟朝未餐。飘荡兵甲际,几时怀抱宽。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当念著白帽,采薇青云端。”^{[2][P1939]}这里的“董挺”即是与刘禹锡交往的董挺,“小长安”指桂林^[3]。诗的内容是写杜甫送别董挺。说明董挺年青时不仅认识杜甫,而且确实与杜甫有过密切交往。从《董氏武陵集纪》推测,董挺对刘禹锡应该说过这段往事,并且很可能把这首诗拿出来给刘禹锡观赏(杜甫这首诗或许也保存在《董氏武陵集》中)。董氏既然嗜诗,那么

收稿日期:2016-11-15

作者简介:范洪杰,男,1985年生,山东东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①“元和体”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义指,就指涉的作者来说,有特指元、白的,有广泛地指元和时期有突出表现的众多文人的(兼包诗文)等等。具体参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元和体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36-337页)、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8-325页)等论著。但“元和体”最初指涉的作者应该是元、白,此处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向杜甫请教诗学是很自然的。暮年的董挺与刘禹锡相遇,很相得,二人很可能共同谈论了杜甫的诗学。

元和八年,杜甫的灵柩由孙子杜嗣业运送北归,途径江陵,请元稹写下《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江陵与朗州一江之隔,刘禹锡与元稹这时期又频有诗歌往来,想来杜甫在这段时间内或许成为此间诗人们关注的话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刘禹锡一定完全赞同元稹的全部观点。

长庆年间韦绚向任夔州刺史的刘禹锡请益所成的谈话记录《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三条谈及杜甫诗句和作法,可见刘禹锡对杜诗的关注程度。《刘宾客嘉话录》:“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尝讶杜员外‘巨颿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1] [P1317]}该句出自杜甫在蜀所作《义鹘行》,可见刘禹锡对杜甫作品非常熟悉。刘禹锡还比较杜甫和其他诗人作品的优劣:

茱萸二字,经三诗人用,亦有能焉。杜公言“更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学他年少插茱萸。”杜公为最优也。^{[1] [P1375]}

另外,“为文不惬意”条中有“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苹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1] [P1393]}。这一条出于《云溪友议》,陶敏先生辑入《刘禹锡嘉话录》,标题也是陶先生所拟。“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苹愁杀白头人”是杜甫《清明》二首末二句。提到的“虽为一篇”,可能指的是《望洞庭》一诗^①,与杜诗相比较,刘禹锡觉得自愧不如。总之可以看出,刘禹锡是自觉地关注杜甫,重视学习杜甫诗歌经验的。这也可以从刘禹锡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印证。

二. 气格的接受

杜甫诗风多样,但以“鲸鱼碧海”为其本色。刘禹锡心胸豪迈,对于杜诗的雄劲诗风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和发展。杜甫的古体诗之浑厚自不待言,同时他又改造了初盛唐以来华丽单调的律诗(主要指七言律),以古入律,使得律诗也表现出雄深的风格来。然而,中唐大历和贞元时期在律诗创作上并没有沿着杜甫的路子向前走。刘禹锡则是接续了这一路数,在律诗中展现出雄豪之风。诗论家是注意到杜甫在这一方面对刘禹锡的引领作用的。如叶燮“自(杜)甫之后,在唐如……刘禹锡……之雄杰……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原诗》卷一);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五评价七律《始闻秋风》:“下半手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指的是豪劲的诗风;翁方纲推尊《西塞山怀古》“即中唐之《秋兴》《古迹》”(《七言律诗抄》),指的是非凡的笔力,等等。

刘诗的气格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刘禹锡早年跟随灵澈、皎然等学诗,所以刘禹锡受到江南吴越诗风的切实影响。高棅就说“元和以后,述贞元之余韵者,权德舆、刘禹锡而已”(《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余响》),所谓“贞元之余韵”,也就是传承自大历诗风的那种贴近南朝时期的以清丽或绮丽为主的诗风。比如刘禹锡的乐府诗,不少就体现出六朝风味。刘禹锡有一些以客观的视角写“情”的诗歌,呈现靡丽的风格,以致于受到古代诗评家的批评。何焯“外集第五卷,大抵少作,犹是贞元诗人风格,未能以雄奇豪,或有不得已而牵率属和,诗虽工而非士胸怀本趣者亦作焉。今编次凌乱,则失作者之意矣。”(《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1] [P31]}主要是论刘集编次的,但从风格着眼,很有眼光。大体是说刘禹锡早年的诗作还是贞元诗人风格,后来诗作中称擅的豪气尚未形成,这大体不差。

当然从刘禹锡此期的实际作品来看,已经有少数几首古体诗展露气骨,如《华山歌》等。又《题招隐寺》:“隐士遗尘在,高僧精舍开。地形临渚断,江势触山回。楚野花多思,南禽声例哀。殷勤最高顶,闲即望乡来。”^{[1] [P16]}颈联“楚野花多思,南禽声例哀”与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的关联性就很强,是典型的南朝诗的写法,但其他诸句“地形临渚断,江势触山回”就已经有较为雄劲的气势了。这首诗总体来说与杜甫早年的《题兖州城楼》比较接近。这说明刘禹锡在贞元时期在气骨上已经有所表现了。

^① 学界目前对韦绚在刘禹锡身边究竟待过多久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刘宾客嘉话录》已经涉及到刘禹锡在开成时期的一些言论,想来是韦绚写作时所附记的。《望洞庭》一诗作于刘禹锡由夔州赴和州刺史任的途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韦绚也跟随刘禹锡去和州,但并不妨碍韦绚后来将刘禹锡对此诗的评论记录在书中。当然,刘禹锡所指的诗是否是指《过洞庭》之外的作品,不排除这种可能,尚待考。至少从现存的刘集来看,《过洞庭》是直接描述洞庭湖的七言诗,比较符合刘禹锡的描述。

虽然刘禹锡的前中期诗中贞元旧风和雄豪气格总体上是并列存在,各有表现,但从刘禹锡诗风的发展过程来看,刘诗的气格可以说是对大历、贞元诗风的有意识的反拨。大历诗人大体接续了王维、李颀等盛唐诗人的创作路子,重视律诗,在写作技巧上更为成熟,不过因为相当多的作品风格清空,多有哀伤之景,所以也造成了“体格日卑,气运日薄,衰态毕露矣”^[4]的问题。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期仍未有根本转变。上面所引用的高棅所说的“贞元之余韵”就是指这个情况。刘禹锡以其“天行健”为思想底蕴(刘禹锡精通易学)的爽朗性格,在不少作品中陡然出之以雄豪之笔,取向上一路,接续了杜诗的脉络。白居易称其为“诗豪”,“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就是对刘禹锡这种诗风的肯定。尤其在律诗风骨的艺术追求上:与刘禹锡同时的韩愈笔力也很雄劲,但律诗有限;元、白律诗写作侧重流利和通俗,似不在此体上追求气格。所以中唐诗人在律诗上求得气格,继承杜甫诗学精神的,要以刘禹锡最具代表性。

三. 重视用事和对用事技巧的继承发展

《刘宾客嘉话录》中有刘禹锡的“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和“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的说法,他对自己的《祭杜中丞文》中“事吴”一典为前人所未曾用而自得^{[1][P1377]},这可以知道刘禹锡对用典的重视程度。白居易说刘诗“微婉”(《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这也与刘禹锡善于用事有关。陶敏先生认为这是造成对刘集的校勘注释工作难度较大的重要原因^{[1][P17]}。

杜甫善于用事,刘禹锡也精于此道。刘禹锡继承了杜甫重视用典的态度而加以强调,同时在用典技巧上也有继承和发展,使之更为纯熟。刘禹锡把经典语据的强调作为诗文取得典雅风格的有力手段。宋人江西诗派说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与洪驹父书》),而赵翼《瓠北诗话》卷八《黄山谷诗》:“刘梦得论诗,谓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孙莘老亦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山谷尝拈以示人,盖隐以自道”;卞孝萱先生也强调杜甫作诗如元稹所说“怜渠直道当时语”(《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并不特别着意于为文的来处,可见刘禹锡是“须有来处”说法的真正创立者。^[5]此说自有道理。但元稹所说只是杜甫诗的一个方面,而且从刘禹锡发现杜甫“巨颡拆老拳”暗用史传之语的例子可见,刘禹锡是充分认识到杜甫诗作典据性突出的特征的,并受到相当的启发。在诗歌语言的经典根据的强调上,刘禹锡是杜甫和江西诗派的中介。

从刘禹锡的创作看,他受到杜诗什么启发呢?刘禹锡所说的“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除了杜甫外,还有另一例“宋考功(笔者注:误,应是沈佺期)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簠’处注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1][P1318]}这个例子是说明经典语是以“六经”及其注疏为典源的,“饧”、“糕”虽都是日常物事,但“饧”在“六经”及其注疏中有根据,才敢使用。而在杜甫的例子中,刘禹锡注意到了在经部之外把史传也作为典源。如果“饧”、“糕”等强调的是字词上的根据,只是影响诗的用词的雅俗,那么“老拳”之例明显是诗意上的暗用,诗句和典源之间存在诗意的关联,“巨颡拆老拳”隐然在用石勒的雄豪来暗喻和形容巨鹄的凌厉雄劲。语典暗用正是刘禹锡求得诗意含蓄的一个法门。

杜甫“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刘禹锡“谩读图书三十车”(《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都是博学多识的。《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海云悬飓母,山果属狙公”,自注“按狙公宜斥赋芋者,而《越绝书》有猿公,张衡赋南都有‘猿父长啸’之句,古文士又云权父,由是而言,谓猿为父旧矣”。说明“狙公”不是指养狙的人,而是指狙父,这涉及对《庄子》之典怎么理解的问题,刘禹锡引《越绝书》和张衡赋等先例来印证,可见刘禹锡用词之不苟,这是为了防止人们因文生意而注。刘禹锡对史籍和前贤诗作非常熟悉。他善于用典,能在诗句中用典如水中着盐,使人不觉。这种本领可以说是对杜甫的用典手法的继承和拓展。古人对此已有觉察,顾嗣立《寒厅诗话》云:

作诗用故实,以不露痕迹为高,昔人所谓使事如不使也。盛庶斋如梓谓“杜诗‘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皆寓禹事,于题禹庙最切,‘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皆养亲事,于题中扶侍字最切。”余谓刘宾客诗“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谢朓,读之使人不觉,亦是此法。^{[6][P185]}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出自《送蕲州李郎中赴任》，暗用典故，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兴味。刘禹锡用典一般都很贴切，他给白居易的诗说“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这其实正是刘禹锡使事用典欲达到的境地。方回赞美刘诗就说“善用事，笔端有口，未易可及”^{[7] [P184]}，说明了刘禹锡用事技巧的纯熟。

四. 句法、章法等表达方法方面的影响之迹

刘禹锡对杜甫表达方式的学习和使用，古人已有观察。朱庭真《筱园诗话》卷三“纯用实字，杰句最少，不可多得。古今句可法者，如……刘中山‘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高唱入云，亦名句之堪响工部者。”^{[8] [P2375]}这是称赞“纯用实字”以成“气魄雄厚”的“杰句”的例子。在具体的句式和句法方面，刘禹锡对杜甫也有明显的借鉴之处。黄彻《碧溪诗话》：“老杜‘卿到朝廷说老翁，漂零已是沧浪客。’又‘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其后梦得《送陈郎中》云‘若问旧人刘子政，而今头白在商于。’”^{[9] [P371]}表达方式确实一脉相承。在构成句眼意义的用词的领会上，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刘禹锡‘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9] [P425]}，“一方明月可中庭”出自《生公讲堂》，“可”字是新而不怪，黄庭坚对这一句很欣赏“山谷至庐山一寺，与群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〇引《洪驹父诗话》）然刘禹锡此种表达杜甫已有先例。这种例子所在多有，刘禹锡的“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与杜甫“月是故乡明”同致；杜甫《又示宗武》“试吟青玉案，莫羨紫罗囊”，刘禹锡《酬郑州权舍人见寄十二韵》有“学堂青玉案，彩服紫罗囊”；《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城基历汉魏，江源自宗巴”是从杜甫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而来。

杜甫有绝句《存殁口号二首》章法别致，“席谦不见近谈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10]每首诗写一个逝者，一个存者两人。刘禹锡有一首《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章句惭非第一流，世间才子昔陪游。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任向洛阳称傲吏，苦教河上领诸侯。石渠甘对图书老，关外杨公安稳不？”^{[1] [P528]}中间两联，“吴宫”，“边月”分别指张籍和李益的离世，“任向”，“苦教”分别指当时任太子宾客分司的白居易和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一联写逝者，一联写生者，章法上虽不如杜甫的奇特，但也是对杜甫绝句章法的某种承袭。当然从题目来看，这是刘禹锡对令狐楚诗的和作，令狐楚的原作可能也是这种章法，可惜令诗不存，难以断定，姑视为刘禹锡诗作的特别表现。

下面根据不同的诗体来揭示刘禹锡与杜甫的诗学联系。刘禹锡那些工稳顿挫的五律是学习杜甫的。比如刘禹锡的《蜀先主庙》，通体雄浑、整练，何焯评曰“二十字中，无字不典，无字不紧，老杜执笔，不过如此”^{[1] [P313]}；又如《故相国于司空挽歌》即是学习杜甫工稳顿挫艺术的。

七律方面，整体来看，刘禹锡与杜甫是有一些重要差别的。沈德潜对唐代七律的艺术源流作了辨析：“七言律，平叙易于径直，雕镂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难。初唐英华乍启，门户未开，不用意而自胜。后此摩诘、东川，春容大雅；时崔司勋、高散骑、岑补阙诸公，实为同调；而大历十才子及刘宾客、柳柳州，其绍述也。少陵胸次阔阔，议论开辟，一时尽掩诸家；而义山咏史，其余响也。外是曲径旁门，雅非正轨。”（《唐诗别裁集·凡例》）沈德潜把七律分成两个路子：王维、李颀、崔颢、高适和岑参的“春容大雅”一路，杜甫的“胸次阔阔，议论开辟”一路，并认为刘禹锡的创作是接续前者的。许学夷说刘禹锡“其集变体实少”（《诗源辨体》卷二九），也是这个意思。古代诗评家认为刘禹锡七律是接续刘长卿的七律诗风的，将二人并列为中唐七律的两个代表诗人^[11]，也是侧重强调刘禹锡七律与大历诗风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系统就“形同陌路”，刘禹锡的七律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化的，而且刘禹锡的七律也确有学习杜甫的地方。《始闻秋风》的“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与杜甫《登高》“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前后影响之迹就很明显，不仅是声情和句法的相似，而且全诗的感情类型和写作方法上也可见杜甫的影响。还有，叶梦得“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有纤馀，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雄健，然每苦意与语俱尽……不若刘禹锡《贺裴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

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12]《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初开郾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与杜甫《寄杜位》相比较“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坐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二诗内容不同，感情色彩不同，但写法近似，表达的声情和用词的抑扬虚实之间很像。刘禹锡对杜甫诗作是有所领会和规摹的。

刘禹锡的古体诗《武陵观火诗》（元和二年）描写大火的声势，用笔雄劲，想象怪伟。元和时期出现一批描写“火”的古体杰作，皇甫湜《陆浑山火》、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和刘禹锡的这首《武陵观火诗》都是代表作。此前在古体中大幅对“火”进行赋写的是杜甫，他有《火》一诗，应该是对元和诗人对“火”的描写产生直接影响的诗篇。韩愈和皇甫湜的作品极为怪奇，其构思和物象的来源较为复杂，而刘禹锡诗作的怪奇程度稍逊，构思和事象与杜甫的《火》诗的联系更直接，而且杜诗和刘诗都是五古。刘作描写火势一段：

盲风扇其威，白昼曛阳乌。操纆不暇汲，循墙还避逾。怒如列缺光，迅与焚轮俱。联延掩四达，赫奕成洪炉。汹疑云涛翻，飒若鬼神趋。当前迎焮焰，是物同膏腴。金乌入梵天，赤龙游玄都。腾烟透窗户，飞焰生栾栌。火山摧半空，星雨洒中衢。瑶坛被髹漆，宝树攒珊瑚。花县与琴焦，旗亭无酒濡。市人委百货，邑令遗双凫。馀势下隈隩，长燹烘舳舻。吹荧照水府，炙浪愁天吴。……众焰合星罗，游氛铄人肤。厚地藏宿热，遥林呈骤枯。火德资生人，庸可一日无？御之失其道，敲石弥天隅。晋库走龙剑，吴宫伤燕雏。……

对比杜甫全诗对夔州山火的描写：

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妒。罗落沸百泓，根源皆万古。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风吹巨焰作，河棹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渚。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尔宁要谤讟，凭此近茨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2] (P1298)}

二诗都夸张地写到神物受大火逼迫的场景，给诗作增添了奇异色彩；尽管刘禹锡的“瑶坛被髹漆，宝树攒珊瑚。花县与琴焦，旗亭无酒濡。市人委百货，邑令遗双凫”及“晋库走龙剑，吴宫伤燕雏。”从典故与现实结合的人文的角度写大火造成的后果，带有刘禹锡随笔涉典的特色，但不能否认二诗的关联，叶矫然曾罗列了二诗的描写片段，说刘诗“瑰伟不凡，亦堪仿佛杜公。”（《龙性堂诗话初集》）^{[8] (P974-975)}，可以说，刘禹锡是直接受到杜甫这首诗影响的。

作为一种特别的题材，杜甫有《夔州歌》，这种对民歌的重视态度为刘禹锡所继承。他进一步学习民间艺术，并进行适当的文人化，创作了一批《竹枝词》。黄庭坚称赞刘诗“元和间诚可以独步”，“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13]。

五. 主体精神的比较与怀古咏史诗的表现

对于诗歌来说，情韵是构成诗性的必要因素，但从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并不是所有诗人都是纯粹抒情的，而是形成如叶燮所说的“理”、“事”、“情”诸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协调统一的状态。诗人的心性有主心与主理之别，从而影响到诗歌风格和诗学气质。杜甫是主心的，刘禹锡则是主理的。主心者，能视天地万物与政治民生为一体，地负海涵，宇宙之内的事情都在自己一“心”之内，都是心眼之光的投射。^①所以言志叙事，都是一己感情所注，真诚贯通，体大浑涵。主理者，倾向于认为自然与社会政治有各自的理则存在，善于观察事和物本身的趣味和理致，虽然诗中并不缺乏情韵，但对事象习惯采取一种审视和较为客观的观照态度，善于描摹，善出新见，所以抒情写物多能清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集部·别集类三·刘宾客文集》：“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意思是刘禹锡的诗精意较多，情韵和含蓄性则稍微缺乏。比较二人的咏史怀古诗，会发现杜甫诗中有“我”，诗人主体和历史相互渗透，刘禹锡则采用相对客观的视角和理性态度，站在对历史审视的立场上。方东树比较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与杜甫《咏怀古迹》后认

^① 所谓“民胞物与”之怀，与宇宙万物、政治民生的感通之心，杜甫的这一精神品性在宋代开始得到揭示。笔者认为这一品性并非只是存在于杜甫的某个时段的某些诗中，而是杜甫的主体精神的整体特征。

为“大约梦得才人，一直说去，不见艰难吃力，是其胜于诸家处；然少顿挫沉郁，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不及杜公”^[14]清楚地说明了二人诗歌表现的这种区别。

但无论是主心还是主理，优秀的诗人都能对人情物理有深刻的了解，形之于诗。如刘禹锡《经伏波神祠》：“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麈鬣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1]感慨很深，见识不凡。方回说“能道马伏波心事。此公笔端老辣，高处不减少陵。”^[7]这是说刘禹锡对人情物理的洞察力是不逊于杜甫的。

作为一种相对来说更密切地关系到思想和学识的诗歌类型，咏史怀古诗在二人的创作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方世举《兰丛诗话》：“怀古五七律，全首实做，自杜始，刘和州与温、李宗之，遂当为定格。”^[8]作为一种诗歌类型，咏史诗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成立，真正的怀古诗则要到隋和初唐时期才出现。^①杜甫可以说是盛唐时期创作怀古诗较多的诗人。他的《咏怀古迹五首》和《蜀相》等都是将咏史诗的写法和怀古诗的意绪交织在一起；刘禹锡继承并发展了杜甫的怀古诗这个诗型。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将刘禹锡的五律《蜀先主庙》视为杜甫长篇五排《谒先主庙》的“注脚”^[8]，看出刘诗在意旨上是对杜诗的规抚。当然刘禹锡也有自己的变化，他似乎更有意的侧重“怀古”一面，面对历史陈迹，将时间空间化，时间意识更为增强，抒发一种古今兴衰之感。何焯评刘禹锡的五律《金陵怀古》曰“此等诗何必老杜？才识俱空千古。”^[7]一等的胸襟才能做出一等的诗作，在这方面杜甫和刘禹锡可以“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了。刘禹锡写出了一系列包括《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汉寿城春望》等怀古名篇，引领了中晚唐咏史怀古诗创作的潮流。

总的来说，刘禹锡作为中唐独立于韩孟和元白两大诗派的名家，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质。但这也是充分利用此前的各种艺术传统，以自己的标准加以选择、学习和创造的结果。杜甫作为影响中唐诗坛的巨匠，刘禹锡的诗在使事用典、雄浑诗风、句法、章法等方面都受杜甫的影响，在怀古诗方面更是继承发展了杜甫的诗歌艺术。

参考文献：

- [1]陶敏、陶红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 [2]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3]陶敏. 全唐诗人姓名汇考[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6.
- [4]胡应麟. 诗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5]卞孝萱、屈守元. 刘禹锡研究[M].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 [6]王夫之等.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方回选评, 李庆甲集评校点.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8]郭绍虞编选, 富寿荪校点. 清诗话续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9]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11]孙琴安. 唐七律诗精评[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 [12]叶梦得. 石林诗话[A]. 何文焕编. 历代诗话(上)[C].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黄庭坚. 跋刘禹锡《竹枝词》[A]. 豫章黄先生文集: 卷二十六[C]. 四部丛刊(影印本).
- [14]方东树. 昭昧詹言(卷十八)[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责任编辑: 启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Yuxi and Du Fu in Poetry

Fan Hongjie

Abstract: Du Fu's poetry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two poetic schools afterwards, namely, the school of Yuan and Bai, and the school of Han and Meng. Liu Yuxi was independent from these two schools, yet he also kept a close attention on Du Fu's poetry. In terms of using ancient texts and stories, forceful and vigorous style, composing structure, etc., Liu has been obviously affected by Du Fu. Liu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Du Fu's artistry of recalling antiquity poems, and both men have profound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xtraordinary breadth of mind.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spiritual orientation, which have different demonstration in their poems of recalling antiquity.

Key words: Du Fu; Liu Yuxi; vigorous style; using ancient texts and stories; composing structure

^① 此处参考了日本学者斋藤茂的观点,见斋藤茂著、王宜媛、韩艳玲译《文字鬪天巧——中晚唐诗新论》,中华书局2014年,第175页。又施蛰存说“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初唐首次在诗题中出现“怀古”一词,如李百药《郢城怀古》、《涂山怀古》等,此前陶渊明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诗题中出现“怀古”一词,但并非真正的怀古诗。有时唐人在诗题上并不严格区分“咏史”和“怀古”之名,出现混用的情况,但创作观念上还是有对二者的明确区分;有些怀古诗也许作者并不是亲临古迹,但确实仍是针对古迹而发。